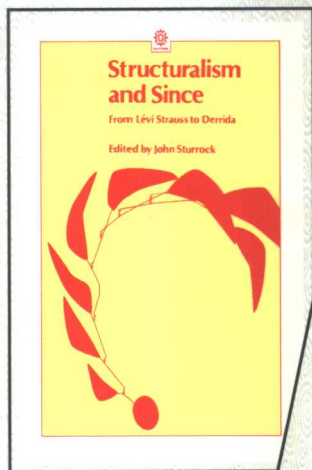


牛津
Oxford
精选



〔英〕约翰·斯特罗克编
渠东 李康 李猛译

结构主义以来

从列维—斯特劳斯到德里达

辽宁教育出版社
牛津大学出版社

辽宁教育出版社
牛津大学出版社

结构主义以来

从列维-斯特劳斯到德里达

〔英〕约翰·斯特罗克编

渠东 李康 李猛译

Structuralism and Since

From Lévi Strauss to Derrida

Edited by John Sturrock

037846

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结构主义以来：从列维 - 斯特劳斯到德里达 / [英] 约翰·斯特罗克编；渠东等译. -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
(牛津精选)

ISBN 7 - 5382 - 5020 - 4

I. 结… II. ①约… ②渠… III. 结构主义 (哲学) - 思想评论 - 法国 IV. 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3256 号

Structuralism and Since From Lévi Strauss to Derrida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总策划、总发行人：俞晓群

责任编辑：王之江

美术编辑：宋丹心

装帧设计：郑在勇

技术编辑：袁启江

责任校对：马 慧 王 玲

出 版：辽宁教育出版社 牛津大学出版社

印 刷：沈阳新华印刷厂

发 行：辽宁省新华书店

版 次：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 1092 毫米 32 开

字 数：174 千字 插 页：4

印 张：7.875

印 数：1—10000 册

定 价：14.50 元

导 言

1966年，法国有家文学期刊刊登了一幅后来常被转载的漫画，画的就是与本书有关的四位思想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尔特、米歇尔·福柯以及雅克·德里达，他们像漫画中的野人那样，裹着草裙，戴着脚镯，围坐在热带林荫下（在这群人里，只有拉康博士显得比较花哨，还系了一只领结）。这幅画不需要任何文字说明，直到后来才有了个标题，叫做《结构主义者的午宴》（*Le déjeuner des stucturalistes*），其实，这四个人什么也没有吃，像是在滔滔不绝地说些什么。

这幅漫画没有一点儿恶意；画家也不想嘲弄他的主人公，他只想说明这些人的出现，为法国的精神生活孕育了一种新的力量。假如他们真的成了南太平洋群岛的荣誉居民，那么它不仅归功于列维-斯特劳斯时代的辉煌——众所周知，这位人类学家讨论了所谓“原始”人的思维过程等问题；同时也起到一种警醒作用，这四位思想家所提出的许多观点都是非常新异的，都很难融入到法国通行的精神氛围之中。与此同时，法国人也必须准备好把自己的思维引入到一条新颖别致的道路上去。

如果我们想在这诙谐的画面里读出更多的涵义，那就显得不太明智了，尽管这幅漫画流传得非常之广。但不能不说，漫画家所选择的这个瞬间却恰到好处。1966年的巴黎，就在漫画家突发奇想，在他作品发表前后不过几个月的时间

里，福柯和拉康也将其两部主要著作《事物的秩序》和《文集》^①公诸于世——在观念史和精神分析这两个各自相关的领域里，这两部著作既显得晦涩难懂，又有着自己的真知灼见。它也许是当代法国思想领域里一个令人难忘的“瞬间”，或者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思想领域经历了萨特存在主义狂飙突进以后的第一个令人难忘的瞬间。60年代末，尽管存在主义的主要宗旨已经逐渐融入哲学思想的主流，但存在主义的信条早已经日暮西山了；所有比较严肃的巴黎知识分子依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但除此之外，他们似乎不太可能去追随其它形式的意识形态运动了。然而，这四位智者却在棕榈树下聚到了一起，好像共同提出了一种意识形态，即“结构主义”。随着福柯和拉康的加盟，再加上已经声名雀起的列维-斯特劳斯和巴尔特，一种新的哲学便初具规模了——这是法国整个思想史中数不胜数的结晶之一，它终于把迄今为止各种支离破碎、看似迥异的观念结合成了一个协调一致的整体。

这些观念是否结合成了一个协调一致的整体，正是我这篇序言所要讨论的问题。我之所以在“结构主义”这个概念上加了个引号，主要是想区分一下这两种情况：一种是社会学现象，即在法国本土和其它地区迅速形成而且影响深远的一场“运动”；另一种是一整套刻板的原则，据说它可以在哲学层面上对结构主义作出确定。因此，为了消解这种如出一辙、形同虚设的区分，他们多次声称结构主义不是一种信

① 本书所涉及到的这五位作家的著作，都注明了已有的英文译本标题，法文本的初版日期。在每篇文章末尾的生平简介里，提供有五位作家之作品的详细资料。

条，只是一种方法：如果某人已经是一位存在主义者了，他就不再会成为一位结构主义者——在巴黎左岸（the Left Bank）^①绝对不会有有什么结构主义的夜总会，也绝对不会有个人身着结构主义的装束，或者去追求结构主义的生活方式。所以说，结构主义只不过是一种考察问题的方法，是一种处理问题的特殊方式，只有这样，结构主义者才能在某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合理地组织有关材料。事实上，在60年代的巴黎，结构主义并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相反，它早在许多年以前就已经形成了，而且也不是在巴黎。换句话说，在60年代的巴黎，这种非常平常的认识工具倒是被人们随随便便地变成了一句口号。从此以后，人们逐渐接受了“结构主义”，并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它在被塑造成一种知识分子时尚的同时，丧失了自己所有命题的涵义。就这样，结构主义变成了一种名誉扫地的“结构主义”，从而使诸如列维-斯特劳斯这样的思想家非常恼火，这位纯粹的结构主义者一直认为，如果他身不由己，被尊奉为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领袖，那么他所有的学术声誉就会付诸东流。从那时起，结构主义和“结构主义”就一并流传到了国外，虽然范围不是很广，影响不是很深，但却带来了不少非常相似的混乱局面。有些人觉得，结构主义的确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发现，能够在特定的研究领域里十分有效地彻底调整自己的想法；但是有些人却发现，“结构主义”只不过是一句不知深浅地在对手面前耀武扬威的口号，或者是一种某个秘密会社的成员标志。

① 巴黎左岸（the Left Bank）：即塞纳河左岸，是大学生、作家和艺术家的聚集地。——译者注

本书的目的，就是不卑不亢地去阐明这五位法国思想家的著作，这些著作通常是与“结构主义”相关的；这里，我主要想确定五位思想家相互之间的共同基础，也正是这种基础，才使他们共同出现在这本书里。如上所述，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幅漫画的标题，即“结构主义者的午宴”总是显得有点儿不大合适，它暗示了四位思想家在思想方面的共同取向，然而在他们的著作里，我们从来就没有证实过这一点。换句话说，在这四位“结构主义者”之间，有些人比其他人更算得上是结构主义者。

列维-斯特劳斯就是这样的极端典型，他一生的工作以及这些工作所依赖的研究方法一直是因循不变的，因此本书最先要讨论的就是他。他有些作品的题目本身就充满了结构主义色彩：如《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1949年）或两卷本的《结构人类学》（1958年与1973年）等。这说明他是一心一意地认同了结构主义。在利用各种有关亲属制度、图腾制度和神话等方面的经验材料方面，列维-斯特劳斯总是认为结构主义的方法是最合适的。实际上，他不想把对这些材料的解释等同于人类思维本身所特有的普遍属性。在众人面前，他总是一直坚持自己在方法、理性主义和为人秉性等方面的一贯立场，并借此向读者传授自己的发现和见解。

不过，其他四位思想家却不太愿意在自己的身上贴上“结构主义者”的标签，他们往往把这种标签看作是对思想自由的严重侵犯。在文学研究中，巴尔特就一直探索着兼收并蓄的研究方法，并始终坚持着一个信念：在不同的理论立场之间不断转换是很有必要的。很显然，他在方法上常常从本书所涉及的其他思想家那里汲取营养。出于同样理由，福柯也曾公开声明他不愿被人们当成一位“结构主义者”：他

不希望自己在意识形态或知识分子领域里具有一个固定的立场，只希望在这个领域里来去自由，出没不定，在自身确证无疑的情况下，对知识和权力的各种历史形式与现实形式进行追问。倘若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福柯的立场是什么？”我们的确很难作出回答。至于拉康，人们都知道他是一位自高自大、独来独往的人物，很喜欢别人亦步亦趋地追随他，而自己却从来不去追随别人，哪怕与别人有一点儿瓜葛。他的远大抱负就是重新树立弗洛伊德的形象，尽管弗洛伊德在法国可谓是家喻户晓，但真正了解他的思想的人却少得可怜。但事实上，拉康对当代法国思想家的著作却没有过多地留意过。最后，与我们所提到过的这几位思想家相比，德里达算得上是目前风头最劲的人物（1966年以前，他没有出版过什么长篇大作，但一年以后，他一口气发表了三部作品），因此，他与“结构主义”的瓜葛比较少。实际上，不管他愿不愿意，他的后期作品无疑表现出了一种灵气，而且常常被人们称作是“后结构主义”，这主要是因为，他在自己著作的主要部分里，细致地解读了许多同代思想家的理论著作，揭示了其中某些未经经验明的理论观点。同巴尔特和福柯一样，德里达坚决驳斥了某些先验思想体系，这些体系曾经为自己的追随者赋予了一种独断地位，使他们居高临下地占据一种优先地位，并以此对其它事物进行大肆评断。与此同时，德里达也始终在各种思想境界之间游移不定。

顺着这条思路，我们可以把五位思想家分成两个不同的类型。列维-斯特劳斯拉和拉康都是普遍主义者，都喜欢在普遍意义上讨论人类思维的运作过程，而不喜欢去考察特定时期的特定思维过程。列维-斯特劳斯主张在各种纷繁复杂的经验事实背后，确立一种普遍的思维结构。拉康作为一位精

结构主义以来

神分析学家，不仅非常重视在诊所或治疗单个病人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具体经验，而且一直还关注着理论，主张对人类心理的一般机制加以规定。与之相反，巴尔特、福柯和德里达却俨然是位相对主义者，他们透过时间的进化过程以及在特定社会里的内涵，更加关注思想的历史维度。他们避免像列维-斯特劳斯和拉康那样超出自己的讨论范围，去建构一种等同于后者所谓的元人类学（meta-anthropology）和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y）之类的东西。

我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想说明如何对这五位思想家进行区分和比较；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当然也可以很自然地被归为其它某些类型。在任何情况下，要想对他们进行对比和比较，就应该首先强调他们彼此之间的分歧，而不是相互共通之处。实际上，他们在某些观点上是有冲突的，而在其它观点上却没有什么冲突。因此，要想在截然不同的研究领域里对五位思想家的近似程度作出确定，的确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我也不认为这种工作究竟会有什么价值可言，因为它证明不了什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思想家之间的特定组合是纯属偶然的。他们多多少少是同时亮相的，这个话题可以更加有力地证明上述说法是不对的。事实上，他们的著作之间是有很多共通之处的，这里的五篇文章还确实需要不断地进行相互验证。可以说，这些“结构主义者”缺少的是一种共同的研究方案，而不是共同的学术渊源。要想找到它们相互发生亲缘关系的证据，就应该去了解这些观念的谱系。

这种共同的学术渊源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语词方面：特定的术语只要是在某部著作反复出现过，就肯定会在其他人阐述这部著作的过程中反复出现。这些术语在法文里也许是

家喻户晓的，但对其他语言来说则不然，巴尔特的《批评文集》（1964年）就证实了这一点：“也许通过有板有眼地求助于意指词库（the lexicon of signification）……我们可以最终捕捉到结构主义的言说记号（the spoken sign）。”我们无法获得我们所期望的形式和明确的定义，但结构主义者却认为自己可以做到这些。我们只能通过使用某些术语来识别巴尔特所说的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结构主义者，不过，他本人还是从结构语言学那里借鉴了这些术语，偷偷地把它塞进了自己的体系中，并迫不及待地宣称自己是忠实于本义的。这个术语就是**记号**（sign），它在“意指词库”中占据着中心地位。

这个专有名词是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年）颇具建树的著作中来的，索绪尔本人在20世纪早期曾经专门从事过自然语言和人类语言的研究，这些研究为所有现代结构主义学说奠定了基础。索绪尔在英语国家中的声望和影响远比在法国逊色得多，在法国，他俨然是一位当代思想之父。从根本上说，这五位思想家都得益于他对语言的真知灼见，特别是他对语言学基本单位，即语言记号的见解。在这里，我不必给记号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这确实是一件难乎其难的事情。我们只需说明，语言中任何一个词都是一个记号，而语言就是作为一个记号系统发挥作用的。

索绪尔把记号划分成两个组成部分：一种是声音，即声字部分，他称之为能指（signifier，法文为 signifiant）另一种是思维，即概念部分，他称之为所指（signified，法文为 signifié）。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事物本身被忽视掉了，因为假如我们要指涉周围的世界，只要求助于语言记

号就行了。所指不是一种物，而只是一种物的观念，特别是在与其相应的能指被说出来以后，这种观念就会进入到说者和听者的思维之中。这样，能指就构成了语言的物质方面：在口语里，能指就是说出来的或听得到的有意义的声音；在书面语里，能指就是字里行间有意义的标记。所指构成了语言的思维方面，它常常被看作是非物质的，即使在大脑中所指仍然是一种神经作用的结果（neural event）。对研究语言的理论们来说，所指和能指是可以按照这种方式划分开来的，但在现实生活里，这两者却是不可分的。完全没有意义的声音就不能算是能指，因为它并没有意指什么——如果没有所指，能指也就不会存在^①；同样，如果某个概念没有表达的途径，换句话说，它既不能内在地物化为思想，又不能外在地物化为言语，那么它就不可能存在——没有能指所指是不存在的。

这三个术语，即记号及其两个组成部分，不仅共同构成了巴尔特所提到的“意指词库”，同时他也把它看作是特定作家与结构主义具有紧密联系的充分证据。甚至可以说，在我们阅读这五篇文章的时候，要时刻留意一下能指和所指的区别，否则我们就无法充分领会其中的涵义。除了在分析自然语言的构成记号以外，上述区别对其它情况来说也都是适用的。在日常生活里，我们经常会接触到许多没有语言意义的记号：如图画（picture）或拟象（diagram）等。但实际上，不管这些对象究竟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都能够起到传

① 这里，人们必须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可以单纯构造出来一种“没有意义的”（meaninglessness）能指，尽管它所意指的是一种“无意义”（nonsense），但这毕竟是一种有效的所指。

递信息的作用，即**意指作用**。如果花儿还只是在静悄悄地开着，我们就无法把它当成一种记号，因为并没有什么东西已经呈现出来并将它变成一种记号。但对于文化来说，花儿可以而且常常被用作一种记号：比如说把它扎成花环，作丧事之用等。在这种情况下，花环就是一种能指，用我们的话来说，它的所指就是“慰藉”。（也许对花环而言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所指，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有关花儿的语言太笼统了；但我们至少可以说，所有花环都肯定具有某种意指作用。）

因此，通过类似于花环这样的记号来进行信息传递，是由迎接送往的人们所固有的文化生活决定的。花儿并不是一种**自然的**意指，它只是一种文化意义或传统意义上的意指。（列维-斯特劳斯深入透彻地告诉我们：当我们无法搞清楚人类的特征究竟是什么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把自然和文化混为一谈。）当我们把它们用作记号的时候，实际上它们已经作为一种**符码**（code）进入到它们平常所指的事物之中，这种符码就是把当事人双方以及这种文化交互过程连接起来的沟通渠道。因此我们有必要指出，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几组语词构成了一个简单的记号：也就是说，一组记号构成了一个记号。实际上，在我刚才引用的巴尔特的那句话里，由三个不同记号组成的“意指词库”本身也同样被用作一个记号；对那些有研究、有准备进行解释的人来说，它所传递的信息就是：“我是一个结构主义者”。对记号的总体研究，以及对体现在具体文化中的大量符码作用的研究，可以使我們更好地解释这些记号，因此，在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人们总是以符号学（semiology）的名义来从事这些研究工作，不过在美国，人们则通常以符号学（semiotics）的名义来从

事这些研究工作。^① 这样，索绪尔就再次变成了确立普遍的记号科学的肇始者。

不仅如此，索绪尔还提出了其它两组对立概念，这对我们去理解我们正在面临的思维方式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索绪尔在研究语言的过程中，最先区分了他所说的语言 (langue, language) 和言语 (parole, speech) 这两个概念。“语言”是一种理论体系或语言结构，在语言的言说者彼此进行沟通的时候，“语言”是他们必须遵循的整体语言规则；言语是单个言说者在日复一日的现实生活里所使用的系统。人们常常很有建设性地把这种区分同美国文法学家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 所提出的至今还很通行的著名区分加以比较，乔姆斯基区分了语言能力 (competence) 和语言行为 (performance) 这两个概念，前者指的是能够恒久驻留在我们头脑中的语言理论，后者指的是我们对这种理论的实际应用过程。对索绪尔来说，语言学家的本职工作就是去研究语言，而不是言语，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把握语言产生实际功用的原则所在。除此以外，本书还要考察另一种同样重要的区分，即结构 (structure) 与事件 (event) 的区分，换句话说，就是抽象的规则系统与系统所产生具体的和个别的事件之间的区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孰先孰后的问题——是结构先于事件，还是事件先于结构——曾经引起过人们的广泛争论。

① 有趣的是，这对可以相互置换的术语实际上是一个符码。如果我说“我是一位符号学家” (I am a semiologist.)，那么实际上我就声明了我忠实于索绪尔或欧洲的记号研究模式；如果我说“我是一位符号学家” (I am a semiotician.)，那么实际上我就认同了杰出的实证主义哲学家皮尔士 (C. S. Peirce) 所创立的北美模式。

在这里，我还要提到索绪尔所做的第三种，也是最后一种区分，即研究过程中的**共时**（synchronic）坐标轴和**历时**（diachronic）坐标轴之间的区分。以索绪尔自己的研究主题为例，我们可以沿着两条截然不同的坐标轴同时进行语言研究：即作为一种在特定时刻产生作用的系统，或经过时间演变而来的制度。索绪尔自己比较推崇共时性的语言研究，而不是19世纪语言学前辈所从事的历时性的语言研究。这些研究一开始就被特称语言史、词源学以及语音变化等抢占了地盘，它始终专心致志地探求着语言的总体结构，并且在进化过程中的特定时刻将这种结构凝固起来，以便更容易理解语言结构作用的原则。

这样，语言学就在研究角度上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转换，即共时性的或结构性的角度。人们本来应该认识到，总体语言学研究必须把两种角度结合起来，但是为了给语言学建立一种更牢固、更有效的基础，人们常常预先就忽略掉了历时性的角度。结构主义在整体上必须是共时性的；它所关注的是人为条件和非历史条件下的特定系统和结构，它要想对现存的语言作用加以解释，就必须忽略它得以产生的系统或结构。因此，特别是在法国，结构主义发现自己与马克思主义是针锋相对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否认历史的做法都是不可思议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充满了极端历史主义的色彩，具有历时性的特征；它与纯粹的结构主义是无法调和的。

索绪尔语言学对结构主义的另一种影响并不仅仅是词汇问题，它表现出了某些最深刻、也最让人捉摸不透的特点。索绪尔语言理论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语言记号是“任意的”（arbitrary）。这种任意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由于能指及

其所指涉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只是习俗意义上的，而不是自然意义上的，所以能指本身也不过是任意的（而所指却不同）。比如说，所有的树都没有真正的共性，都无法使我们必然地或合乎逻辑地把它们说成是“树”（trees）。即使我们这些持有盎格鲁口音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这样称呼它；但法国人却有所不同，他们把它称作“arbres”。在所指层面上，语言也同样是任意的，每一种本土语言在整个词语表达领域里都具有不同的方式，在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一点。一种语言所具有的概念，另一种语言就可能没有。语言学家在说明这种任意性的时候，特别喜欢列举一些描述颜色的术语，在这个方面，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别简直是太大了，即使人们通常认为，颜色本身就是一种由波频决定的自然连续光谱。

根据这种双重任意性特征，索绪尔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语言系统并不具有某种固定不变的本质，而是在形式上变换不定。语言本身是它的各个单位所组成的关系系统，这些单位本身也是通过与相关单位之间的差别来构成的。我们不能说，语言单位是自我持存的，它们必须在其相应的其它语言单位那里获得自身同一性的基础。正是特殊的语音单位或语义单位在语言系统里所占有的地位，确定了这些单位各自的价值。实际上，由于任何事物都无法使这种价值获得稳定性，所以它们常常会产生变化。从自然的角度出发，语言系统在本质上是任意的，具有任意性的事物当然也是可以被改变的。

“语言是一种形式，而不是一种实体”，这句名言就是索绪尔对其基本见解的总结。少了这一点，列维-斯特劳斯、巴尔特以及其他三位思想家的著作就都无法把握了。结构主

义始终坚持着这个基本假设，它的研究也始终关注着系统中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而不是各种独立本质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从语言学的角度具体说明这一点，问题就很容易解释了。任何一个特定的词都不是本质的或独立的，rock 一词便是如此。这个词在语音和语义两方面上都占有着一定的空间。从语音的角度来说，只有确定了它的空间界限，才能够对它加以定义，换言之，rock 只有在与另一种不同的语言记号，如在声音上非常近似的 ruck 或 wreck 相互交错变换的时候，才能确定自己的界限。从语义的角度来说，我们只有把 rock 同其它在语义上非常近似的 stone、boulder 和 cliff 区分开来，才能确定这个能指的涵义。

总之，如果没有差异，也就没有了意义。单词语言 (one-term language) 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单个词项能够适用于任何事物，对它们不作任何区分；它至少需要另一个词项来确定自己。也许通过类似于符码或 bing 或 bong 这样的双词语言 (two-term language)，我们可以对整个世界的全部内涵进行初步区分。如果两个词中的两个元音在发音上没有丝毫差异，那么我们就绝对不会拥有任何一种行之有效的语言。

结构语言学的基本经验为本书的五篇文章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背景。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最清楚地体现出了索绪尔语言研究的意义所在，列维-斯特劳斯就曾宣称，他的精神生活曾经切切实实地受益于两种思想的影响，索绪尔就是其中之一（另外是一位 16 世纪从法国到巴西的新教传教士，他第一次对当地土著进行了现代意义上的人种学描述。）列维-斯特劳斯把人类学现象当成语言来研究（按照丹·斯皮尔伯的说法，列维-斯特劳斯没有发觉自己在隐喻的意义上

使用了语言)。也就是说，他把人类学现象当成系统来研究：如亲属关系系统、图腾制度系统以及神话系统等。他十分重视每个系统内不同单位之间的关系，并且发现，乍眼看去属于同一单位的功能是如何随着它与其它单位之间的关系的變化而变化的。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符号元素的解释简直令人叹为观止，我们许多人都倾向于认为，符号的性质总是固定不变的，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对它作出比较单一的解释。但列维－斯特劳斯却别具一格地认为：在符号每次重现过程中，符号的意义是由它们在特定的神话组织系统中所占有的地位决定的。

这就是从神话本身出发来解释神话，让系统本身在某种意义上规定意义；借助这种方式，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结构主义是如何拓展到文学以及其它书写体系的研究上去的。结构主义为了解释文本或文本群的结构，最先尝试了一种“内在的”批评形式，而且始终表现出了一种心无旁“物”的态度。譬如，在某个剧本里，我们对某种一角色作用的估计，在步骤上是与对特定语言中某个词语的价值的估计完全一致的，我们不能与剧本以外的世界毫不相比，只能与剧本本身的框架相比，只能与剧本所包含的其他角色相比。角色之间的差异总是戏剧意指的线索：对《李尔王》的读者来说，温和恭顺的考德莉亚（Cordelia）如果还只是一个孩子，就很难与高奈莉尔（Goneril）和瑞根（Regan）进行比较。^①

只有狂热的结构主义者才会主张借助这种整体上的文学批评手段，对文学作品的结构进行揭示，认为自己能够最终

① 考德莉亚（Gordelia）、高奈莉尔（Goneril）和瑞根（Regan）是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中李尔王的三个女儿。——译者注